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马 良 / 著



詹姆逊的后现代 马克思主义研究

JAMESON DE HOUXIANDAI
MAKESI ZHUYI YANJIU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马 良 / 著



詹姆逊的后现代 马克思主义研究

JAMESON DE HOUXIANDAI
MAKESI ZHUYI YANJIU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 马良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10
(光明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12 - 0598 - 8

I. ①詹… II. ①马… III. ①詹姆逊, F. - 后现代主义 - 研究 ②詹姆逊, F.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研究 IV. ①B089②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3394 号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著 者: 马 良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武 宁

责任编辑: 刘书永 钟祥瑜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 徐为正 陈文斌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5(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75 1/16

字 数: 314 千字

印 张: 17.00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0598 - 8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编 委 会

主 任：陈 荣 胡祖光

副主任：邵 清 曾 骅 周鹤鸣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力宏	王维安	卢敦基	卢福营
史晋川	朱忠明	朱新力	吴 笛
张旭昆	李 岩	陆立军	周谷平
林正范	郑仓元	郑孟状	徐 斌
郭祥才	梅新林	黄河清	龚建立
彭少健	程惠芳	葛立成	赖金良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邵 清

副主任：刘 东

成 员：叶德清 黄 荻 马少华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总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陈荣

有人说，谁能将中国近三十年来发展奇迹阐释清楚，谁就能得诺贝尔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浙江人民发扬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使浙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十分发达的省份。当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社会各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也是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宝贵财富。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特定地区的精神文化传统相关，因此，对引领浙江市场经济大潮的“浙江精神”的研究、对浙江传统历史人文的研究，也构成了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富有深刻内容的研究领域。此外，浙江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因此对马列理论进行现代阐释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是为时代所用，指导社会经济和生活实践，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既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延续，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的一项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现实需求下，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省

委省政府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为全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组织协调机构，坚持“政治立会，活动兴会，科研强会，外联社会”的工作理念，围绕理论研究、社科普及、成果转化、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五大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组织、协调、管理、推动工作。首先，针对十七大提出的新观点、新问题、新思路进行马列主义的现代理论阐释的需要，联合有关单位启动了“马列专项课题”研究；其次，针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启动了“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课题研究，以及面向全国开展征文活动；再次，围绕长三角一体化，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同时，立足浙江，放眼全国，开展社会经济重要问题的理论以及对策研究；另外，我们连续数年关注民情、民生，开展多项重大省情调研；在浙江历史人文研究领域，我们启动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按“今”（浙江当代发展研究）、“古”（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人”（浙江名人研究）、“文”（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的布局深入组织研究，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浙江学术的优势和特色；等等。在学术研讨方面，以“当代浙学论坛”为龙头，整合各省级学术团体和有关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通过系列化的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等方式，交流当代浙江学人的最新成果，昭示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营造健康、有序、活跃的学术氛围，推进学术创新。

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突出重点，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树立品牌意识，构建良性载体和平台，努力创建科学发展的新格局，推进社科事业新发展。我们积极培育和提升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基地建设、策论研讨、浙江人文大讲堂、科普周、当代浙学论坛、重大省情调研、浙江学术名片等八大工作品牌，组织和动员了各教学科研单位和学术团体以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服务，为繁荣发展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服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自古以来的优秀学术传统，呈现出成果较多、质量较好、气氛活跃、前景喜人的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获得社会承认，为社会所用，将学术成果出版是首要环节。但是由于学术作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往往存在出版难的问题。



因此，资助我省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00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我省设立了“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截止2008年，已资助了351部学术著作出版，有效地缓解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为了集中展示当代浙江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从2006年起，我们将在获得资助的书稿中，由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遴选部分书稿，给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系列丛书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并得到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将之纳入了《光明学术文库》。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探索。文丛的学术质量，既有赖于我省学人的创造性研究，也有赖于每年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的严格把关。因此，文丛的编委会成员，由当年的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成员组成。

当代的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们，既要深入研究、努力传承和弘扬学术思想的优秀传统，又要面向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更要促进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服务浙江现代化建设。我深信，《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出版，对于我们坚持学术标准，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奇迹，总结、探索科学的发展道路，并在各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2009年3月

目 录

引言 缘起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1

第一章 文化危机:现代性文化历程反思 /8

一、视野拓展:文化概念的主客体维度 /9

1. 文化的客体功能性维度 /10

2. 文化的主体性自我意识维度 /13

二、概念辨析: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现代性 /17

1. 对“现代”概念的理解 /18

2. 对“现代化和现代主义”概念的理解 /21

3. 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 /24

三、历史进程:人类理性精神发展之路 /26

1. 人类理性觉醒时期 /27

2. 人类理性独立时期 /28

3. 人类理性崇拜时期 /31

四、路径依赖:现代性文化反思 /36

1. 现代性文化反思:理性吊诡和文化批判 /37

2. 全面检讨:四种反思的理论 /44



第二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57
一、后现代主义: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转向	/57
1. 对待后现代主义的辩证态度	/57
2. 后现代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	/61
二、人的存在方式:意识形态和人	/65
1. “意识形态”概念的传统理解及其泛化	/65
2. 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和客体性	/71
三、人的理想寄托:“乌托邦”情结	/75
1. 道德意义上的乌托邦	/76
2. 政治意义上的乌托邦	/78
3. 文化意义上的乌托邦	/82
四、理论轨迹: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阐释学	/87
1. 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	/88
2. 詹姆逊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	/92
第三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宏观社会语境分析	/105
一、全球化哲学语境:“后现代”的历史解释	/105
1. 全球化发展的理论研究	/105
2. “后现代”的历史解释	/111
二、社会基础的变革:世界政治新秩序下的马克思主义	/114
1. 后现代主义的宏观社会背景	/115
2. 新秩序下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118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辩:终结论及其理论发展	/124
第四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批判:意识形态传统批判	/129
一、从托拉西到黑格尔: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130
二、理论的元批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133
1.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原理	/134
2.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	/137



3.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元批判	/140
三、思维中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批判	/142
1. 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	/143
2. 论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生命力	/144
3. 思维中的辩证法:彻底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	/147
四、批判的批判:错误意识、领导权和文化物化	/148
1. 错误意识和科学意识的对立	/150
2. 领导权或阶级统治合法性(进步和反动的对立)	/152
3. 物化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154
五、批判的转向:从文化批判到语言批判	/157
1.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	/157
2. 阿尔图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	/160
3. 支配权的意识形态	/162
4. 语言上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	/164
第五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意识形态阐释学	/167
一、文化的阐释模式:后现代意识形态理论	/168
1. 对“文化和阐释模式”的理解	/169
2. 对后现代意识形态及其作用的理解	/178
二、三大基本原则: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	/182
1. 叙事和阐释相统一的原则	/183
2. 总体化的原则	/186
3. 形式辩证法的原则	/189
三、文本阐释困境:文本阐释的意识形态性	/194
1. 对文本阐释模式的评价	/195
2. 基督教经典阐释的启示	/197
3. 文本阐释的“三个视域”	/200
四、历史阐释困境:历史阐释的意识形态性	/205
1. 历史主义的困境	/206



2. 四种传统解决“困境”的方法 /208
3.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法 /212

第六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证:资本主义

文化分期理论 /215

- 一、文化主导逻辑:生产方式逻辑的重新读解 /216
 1. 文化分期思想的形成 /217
 2. 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的影响 /221
- 二、文化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阐释学 /222
 1. 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224
 2. 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226
- 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227
- 四、超越后现代主义:认知测绘理论 /230

结语 现代性和意识形态性 /233

附录 论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戏剧实践和理论的影响 /237

参考文献 /248

后 记 /253



引言

缘起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21 世纪是人类新的世纪，人类又一个新的千年辉煌。面向未来，可谓希望和危机并存，机遇和挑战并存。然而，面对着这种新的辉煌的可能性，正如古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卢克莱修曾感慨的那样，“永远是那同样的对生命的焦渴，苦恼着张大着嘴巴的我们。并且总不知道未来将带来什么命运，或者机会可能带来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怎样的结果正在等待着我们。”^① 人们陷入各种对“不确定性”的思索之中，人类自身开始质疑人类本身的理性和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开始担忧人类的未来的前途和命运。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科技生产力的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财富，但同时科技本身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全所未有的却又是紧迫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哲学价值观等问题。科学技术全面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打上了科技的“烙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直接形成了大众消费主义的文化”等等，这些都在不断印证海德格尔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天命”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思想。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物质性财富创造层面上带来了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著名的学术研究团队——罗马俱乐部对人类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全面的抨击。他们在其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最后结尾明确指出：“我们希望提供的最后一个思想是：必须探索他自己——他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献身这两项事业必然是无止境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在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1968 年，当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消费”的“黄金时代”

^① 邹广文：《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04 页。



时，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 30 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罗马，共同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批人士的聚会后来被称为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其宗旨是要促进人们对全球系统各部分——经济的、自然的、政治的、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认识，促进制定新政策和行动。几经努力，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小组最终出版了《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研究报告，其主导思想从该书的副标题“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上一目了然。《增长的极限》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教授等撰写的，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零增长”是罗马俱乐部发展观的核心。该书还指出“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而且，“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得愈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①

罗马俱乐部认为当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成就之时，恰恰也成为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是无法承受“无根基”的生活，这正是“现代人”的悲剧所在，物质层面的财富的增加不仅消耗了大量“非再生性资源”，而且也使人变得越来越“机器化”和“物质化”，这是不可能支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在对既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这种新的发展奠定的前提条件恰恰是要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树立敬畏一切生物物种的生命意识。人类不是地球的统治者和主宰者，人类恰恰是地球本身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不是自然财富的“开发者”，而是地球财富的守护者；人类不应只注重“当代”物质性财富的增长，而且更加应注重人类自身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罗马俱乐部的 A. 佩奇指出：“我们是地球上变化的最高代行者，我们要做的一切，都会给今后的各种事态带来影响，成为左右我们自己未来的主要因素……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类的未来将是有史以来整个地球的未来。”^② 当然，罗马俱乐部对科学技术带来人类物

① [美] 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著，李涛、王智勇译：《增长的极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第 244—258 页。

② [日] 池田大作、[美] 佩奇：《21 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年，第 11—12 页。



质财富增长模式的反思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对科学技术对人类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过度悲观或过度乐观都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更进一步，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已经摧毁了人类本身最重要的“批判性”的维度，“在来源于需要，来源于完全自由的具体实体的自由正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这个程度上，与低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解放，正逐渐失去它们从前的内容。在一个似乎日益能够通过其组织起来的方式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性及政治对立的权利正逐渐被剥夺了基本批判功能。”^① 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正在被社会庞大的系统演变为“被组织化”的人，在对物质财富的不断追逐中，科学技术正在演变成统治人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遮蔽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全面性的认知。人已经成为物质化的“单向度”的人，丧失了“思想自由”的批判精神；社会也成为物质化的“单向度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理性”特征得到充分体现，而价值性理性被“遮蔽”了。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类劳动异化层面上所带来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洛姆向人类发出了警示，人类自然地理性的高度发达并不意味着人类真正的、全面的进步，人类需要超越相对狭隘的理性思维。现代人“努力地工作，不停地奋斗，但他朦胧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多是无用的……人所创造的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②。人在劳动的过程中被自己的“造物”彻底地“异化”，标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机器把人完全束缚，使人成为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机器上“最不稳定”的部件（机械化的流水线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人的工作状态就是失去人的自由度和创造性思维的状态）。当手段变成为目的，那么，作为目的人必然受制于手段。原本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现在为了这种“发展”却以牺牲人本身的创造性为代价，牺牲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代价。显然，在传统认识论中以控制自然、消除物质匮乏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现代性社会中

① [德] 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本书作者根据英文版译文略有修改）。

② [美]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98年，第25页。

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带来了人本身被科学技术所控制的生存困境，伴随着某种人性缺失、精神贫乏、爱和创造力衰退的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是机器的一部分”，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或霍尔巴赫的“人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是有本质区别的。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是为了反对宗教神学的“灵魂不死”的观点，用已经被证实的医学、生理学知识来推论人的存在状态，把人的各种复杂的生命运动、社会运动和思维运动都归结为简单的机械运动，把人的思维（心灵）的本质归结为身体的组织结构和状况。那么，人为什么会高于动物呢？拉美特利认为这是由于“教育的奇迹”。因此，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探寻人类思维的物质性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是机器的一部分”主要强调的是人在精神上困顿于职业性的单调劳动，劳动使人变成“残废的畸形”，劳动也就堕落为强迫的、异化的和无意义的劳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目标就是要解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秩序新的基础，科学技术已取代传统的政治权力而成为统治手段，即科技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已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主要内容和动力，科学技术成为“中心”，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意识”，成为阐释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现象的“理论范式”。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机器这种现象的潮流”^①，反对“技术统治论”，要使社会结构变得非都市化、非群体化和非标准化，力求使人的发展成为全面的“普通”的人。弗洛姆也坚称自己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

确实，在对现代性思潮的反思中，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对人类劳动异化的反思是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其关注的核心就是人类的身心和谐及人性的充实完满，崇尚理性和情感的和谐。显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导的对“现代性科学技术”的批判主要还是诉诸于乌托邦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进行的“消极性”反思，所再现的是“科学技术在自主性”状态下宏观层面与“人全面发展”的矛盾和冲突，而没有从微观层面，特别是经验层面来透视某特殊的科学技术在物质和观念等方面对人类生活的具体影响及其影响程度，这在理论的思辨逻辑上也就无法超越“科学技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dystopia）的局限，从而再次陷入了“科学技术”和“文化审美”的对立之中不可

① [美] 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转引《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自拔。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作用层面上带来的影响。自18世纪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方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显然,在科学技术作用上,更加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在战胜中世纪的宗教愚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主导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价值尺度。正如康德所言:“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避这个批判的。宗教企图躲在神灵的后面,法律企图躲在尊严的后面,而结果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并失去人们对它们真诚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②宗教不可能在知识领域中占据任何的“话语权力”,宗教只能转变成道德领域的基础。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否定性影响,主要包括人类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新迷信”和科技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等,人类开始不断地反思科学技术本身的非至上性。人类的文明活动绝对不可能被简化为“纯科学技术”的知识进化过程。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怎样。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在其领域之外仍然是必要的。”^③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把科学技术的统治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结合起来,认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演变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哈贝马斯进一步解释了在科学技术制度化和社会不断合理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性”的生产力,其直接后果是物质财富高度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④。科学技术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以“科学技术为偶像”是一种新型意识形态性,既科学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当然,尽管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都是法兰克福学派

① [德]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②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页(译文有改动)。

③ [美]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④ [德]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的代表性人物，但他们的理论归宿是不同的。马尔库塞最终在爱欲和美学中寻找从科学技术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途径，哈贝马斯则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和人类交往之间的关联度，强调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则必须使用科学技术，而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则必须到人类的交往中去寻找，这种交往在伦理上是“真诚”的自由的交往。显然，这种不同的归宿却使他们都陷入了“乌托邦”的结局。

现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性反思，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理论：工具论和实体论。在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中，占统治性话语权的理论是“工具论”，例如，“科学没有国界”。这种理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科学技术本身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只有当科学技术与其所服务的阶级及其运用在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等领域之时才能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同样的某项科学技术由不同的人来使用可得到的结果是可以完全不同，原子裂变的科学技术用的“好”是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产生核电；反之则制造原子弹，残害人类自身。科学技术造成的不良问题关键在于对科学技术的不良使用，科学技术本身是无辜的。工具论的科学技术观实际上对科学技术本质的界定，是对科学技术的功能主义定位。这种理论打破了科学技术的“宿命论”，面对科学技术的“步步紧逼”能够仍然坚持对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信仰。

科学技术的实体理论则强调科学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在科学技术的“范式”下来重新建构为一种受控制的对象，科学技术不是单纯的“物”的聚集，而是能够重新塑造世界。现在的“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或“全球一体化”等等都是科学技术实体论的具体表现。现代高新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创造大量的物质性财富，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科学技术不再是一种外在于人类的“工具性”产品，而是内在于人类自身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技术不仅赋予现实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也赋予人类存在合理性。因此，后现代主义的福柯通过权力和知识的系谱学研究，指出科学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知识的新形式和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起源上是相互联系的。福柯认为“人”正在接近其终点，“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他在《事物的秩序》的结尾中写道：“我们敢打赌，人将像海边画在沙滩上的面孔那样被抹去。”^① 在其知识的系谱学中，

① 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